

“一带一路”战略——顺应经济运行发展规律的世界创举

■ 安江林 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

“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实施方式反映了经济运行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片面性与消费全面性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揭示了这一规律并指出其发挥作用的深刻根源存在于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共同本质之中, 它决定了人类只有实现最大限度的平等、联合、协作, 才能形成最进步的经济社会体系。“一带一路”战略将以更加有效、进步的方式推动建设国际互联互通网络、发展跨国经营企业、建立新型世界经济体系, 形成高效的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结构, 健全国际供应链结构, 以共同经济利益的增长逐步化解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在利益和权力分配上的分歧、对抗和冲突, 加快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将经历由商业贸易之路到产业和城市密集带, 再到经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与此相适应, “一带一路”的发展方略应当包括近期发展对策、谋划中期发展和运筹长远之计等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三年多以来, 在上产生了“一呼百应”的超预期效果。到 2017 年初, 已有 100 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30 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6 年 11 月首次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正在深刻、广泛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 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结构升级。这一战略之所以能够赢得世界范围的认同, 成为有效推进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伟大创举, 其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战略意图和战略实施方式反映了经济运行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即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矛盾运动规律。

马克思有关社会再生产矛盾运动规律亦即经济运行发展基本规律的思想, 为近代以来的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是“一带一路”战略获得成功的重要思想基石。“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成功实施, 必将为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突出问题, 以更加有效、进步的方式化解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在利益分配上的分歧、对抗, 加快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开辟新的道路, 同时也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国际合作理论的丰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片面性与消费的全面性矛盾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中将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周期区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基本环节, “生产表现为起点, 消费表现为终点, 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91 页)这四个环节首尾相连、依次过渡, 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行, 以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实现经济发展。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 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职能分别由相应的社会组织系统承担, 这些系统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各自发挥其职能, 物质和精神资料亦即我们所说的“经济要素”在这些系统之间依次流动, 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在每一瞬间同时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 维持经济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再生产周期性运动及其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大体相当于今天我们所



说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 从宏观经济系统总体运行的角度可以分为供给与需求两个侧面, 供给的一侧包括生产、流通和分配, 而需求一侧, 则包括生活消费需求、生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以,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矛盾, 也就是宏观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失衡—再平衡”的矛盾。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观点: 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基本矛盾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 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集中体现为生产的“片面性”属性与消费的全面性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

(一) 生产的“片面性”特征及其本质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过程时指出: “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 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124 页) 为了进一步说明社会分工造成单方面的劳动与多方面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不只是商品生产中的特殊矛盾, 而是一切社会再生产中普遍存在的矛盾, 他将分工的起源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104 页) “在家庭内部, 随后在氏族内部, 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 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 “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 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 and 不同的生活资料, 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 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 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389—390 页) 在这里, 马克思所揭示的从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中产生商

品交换的规律, 表明人的劳动活动、劳动能力以致整个社会的各个生产组织的生产活动和生产能力等, 都有其片面性的自然基础。生理的、种族的、生存环境的差别, 以及个人和社会组织在自己的环境中所能找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自然因素的差别, 决定了每个人的劳动、劳动能力以致各种社会组织的生产活动和生产能力, 都难以逾越由一定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特殊性、片面性、局限性。而后来出现的更为发达的社会分工和普遍的物质交换, 只是扬弃了这种自然的分工, 将自然分工的基础性作用纳入到社会分工的体系之中。马克思指出,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继最初的社会形态之后的第二大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 第 104 页) 所以, 马克思指出的生产所具有的片面性, 首先是来自于自然因素, 受一定自然条件的决定; 其次是这种片面性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其相应的社会形式, 成为具有社会特征的、体现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片面性; 再次是这种片面性通过普遍的商品交换过渡为相对的全面性; 第四是在社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 这种基于分工和交换的全面的生产和全面的社会关系, 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和他们获得自由个性的条件。

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人类自身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特质和本性, 到人类社会形成一定系统结构并保持其发展能力的必然性和内在联系等, 所有这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 都决定了任何一个层次的社会生产主体, 不论是作为生产劳动者个人, 还是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系统, 如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地区, 以及现代的企业、行业、部门、各种经济联合体等等, 他们从事物质性、精神性、信息性、服务性产品的生产, 其生产能力相对于他们的消费需求都无一例外地具有“片面性”的特征。每一个生产主体只能生产出他们的能力所企及的产品, 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 总是受他们各自生理的、社会的、专业技术的、地域综合条件的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制约, 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特殊性、专业性、地域性或局限性。每一个生产主体同时又是消费主体, 只有消费才能使生产主体

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其生产能力。而要消费, 就必须获得相对全面的消费品。消费结构单一或畸形, 消费者就不能成为健康、合格的生产主体, 就不会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供全社会消费。而要使每一个生产主体都能获得相对全面的消费品, 所有的生产主体就必须进行分工并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 从事既有分工又相互合作的社会性生产。这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群体的本质性特征之一, 也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而与自然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之一。

社会生产之所以具有“片面性”并且在分工推动下不断向越来越“片面性”的方向发展, 是因为这种“片面性”的本质就是专业性, 是人的本性和分工规律所决定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生产社会化水平, 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改善社会成员生存条件的根本途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生产的这种“片面性”特征的本质及其与消费的全面性矛盾曾做过有价值的分析。他在列举了制造一件普通衣服的复杂分工的情况后得出结论: “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和合作, 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 即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的。”(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12 页) 亚当·斯密认为, 人类之所以能够解决生产的片面性与消费的全面性矛盾, 在于人类能够“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 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 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同上书, 第 16 页) 亚当·斯密在这里所说的“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 与马克思所说的“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55 页), 都是指专业化的生产。从古至今, 任何一个生产主体, 即使是今天的规模巨大的企业或地域综合体, 甚至是一个大国或若干国家的联合体这样的生产主体, 之所以不可能生产出他们现实的消费活动所需要的吃、穿、住、行、用、享受、发展等多种多样的消费品, 就是因为生产的专业化本质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尤其是在商品经济进入较发达的时代, 生产者是为了自己获得价值的目的而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 因而只能从事为满足别人的消费需求并能发挥自己的专长的“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 这样他才能获得较多的价值去购买比自给性劳动所得更多、更全面的消费品。(下转 02 版)

《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在京发布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协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张宇教授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邱海平教授作了关于 2016 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年

度发展报告的总报告, 南开大学刘凤义教授等分别就报告的具体内容作了分报告。

《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共分为十个部分, 包括: 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 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于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 关于农村土地问题与新型城镇化问题、关于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世界

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等。报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 2016 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各主要领域的发展状况, 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翔实的文献材料。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自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富胜等专家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进行了点评。

与会学者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视, 极大鼓舞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界, 让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出更加活跃的新景象。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 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服务, 从 2010 年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团队就开始发布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

《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报告 2016》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研究中心课题组编制, 自 2010 年以来已经连续发布七年, 报告以专题形式汇集和反映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新成果和新进展, 并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方向, 力图刻画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 旨在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 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服务。(张艳玲)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体系的六大潜在风险

■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最近, 全球宏观经济与中国宏观经济均呈现出显著复苏迹象, 国内外金融市场也稳中向好。发达经济体中的欧元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俄罗斯与巴西, 经济复苏的强劲程度甚至超过了之前的市场预期。分析师们对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增加, 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明显增强。然而, 笔者认为, 2017 年国内外经济金融体系依然面临着一些重要风险, 一旦这些风险爆发, 不仅经济复苏的进程可能发生中断, 而且投资者的风险情绪也可能逆转。因此, 充分认识到这些风险, 并为之做一些准备, 将会有助于增强本轮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以及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风险一: 美国股市发生重大调整

从 2009 年美联储开始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 美国股市就开启了长达八年的牛市。特别是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 美国股市在经历了短暂调整后, 就继续扶摇直上。在欧洲政治风险正在加剧、特朗普冲击也给美国国内政策制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的前提下, 当前美国股市的波动率指标已经降到多年来的谷底, 这一状况是非常令人费解的。换言之, 当前美国股市的投资者过于乐观, 他们几乎 price in 了特朗普冲击的所有积极层面, 但低估了特朗普政策实施的诸多掣肘因素。

应该说, 特朗普医改法案在众议院受阻, 将会成为美国股市重新评估特朗普政策的开始。笔者认为, 在 2017 年的后三个季度, 美国股市发生重大调整的概率是很高的。鉴于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是消费, 而美国股市涨跌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很大。因此, 一旦美国股市发生重大调整, 可能影响短期消费走势, 甚至也会影响到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加息的频率。

风险二: 欧洲进入大选季后可能面临的三重风险共振

在 2016 年以及 2017 年第一季度, 欧元区经济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2016 年, 欧元区经济增速多年来首次超过美国。然而, 从 2017 年第二季度起, 欧元区正式进入大选季, 在二三季度, 法国、意大利与德国都将迎来大选。其中意大利与法国国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的风险不能低估。而一旦这两国国家大选出现意外事件, 对金融市场将会产生直接冲击(例如意大利国家对外国投资者违约, 以及法国宣布脱欧)。此外, 欧洲政治风险上升可能重新引爆南欧国家债务危机, 以及加剧大量持有南欧国家国债的欧洲银行业的问题。换言之, 进入大选季后, 欧元区可能面临政治风险、南欧国家债务风险与银行业风险的三重风险共振。如果这一情景成为现实, 今年欧洲经济走势与欧元走势均不容乐观, 美元指数表现将非常强劲,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将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

风险三: 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复苏可能中断

2016 年, 以俄罗斯与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复苏, 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亮点。目前主流观点认为, 2017 年, 俄罗斯与巴西经济增速都有望在多年衰退后由负转正。然而, 我们也必须看到, 资源出口国 2016 年的经济回暖, 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 2016 年的显著反弹关系密切。我们认为, 2017 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呈现水平盘整态势, 而非继续上升, 这就意味着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复苏基础变得薄弱。此外, 如果美联储今年加息三次以上, 或者欧元区爆发多重风险, 那么这些资源出口国可能再次面临本币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压力。换言之, 在 2017 年, 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 可能面临来自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双重冲击, 其脆弱的经济复苏可能被打断。

风险四: 中国 PPI 与企业利润增速下半年显著回落

2016 年年初至今, 中国 PPI 同比增速出现了十多个百分点的显著回升, 很多人将之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 这也带来了上中游企业利润增速的回升。笔者认为, 过去一年多时间 PPI 增速的显著反弹有三重原因, 一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过进口成本推高了 PPI 增速, 二是国内周期性行业(特别是房地产与汽车)反弹提振了对

工业品的需求,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造成了供给下降。展望 2017 年, 一方面,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由上升转为盘整, 另一方面, 国内周期性行业已经开始回落, 此外, 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方法可能出现调整(由刚性变得更加市场化、更加柔和), 笔者认为, PPI 增速的高点就在今年一季度, 未来可能显著下行, 全年在 3-4% 左右。而受到 PPI 增速下行影响,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可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PPI 增速下行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行的主要影响包括: GDP 增速今年可能前高后低、货币政策下半年可能略微宽松、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面临重大调整风险、股市基本面因素可能有所恶化。

风险五: 一些过分依赖同业融资的中小银行面临破产清算威胁

从 2016 年年底以来, 随着一行三会“控风险、去杠杆”政策取向的强化, 国内银行间市场利率显著上升, 同业存单平均发行利率已经由 3% 左右, 上升至目前的 5-6% 左右。对那些非常依赖发行同业存单、同业理财融资的中小银行而言, 这意味着负债端成本的显著上升。此外, 这些中小银行还面临着如下冲击: 一是 MPA 考核的实施将会显著加剧这些银行的资本金与拨备压力; 二是实体经济违约加剧可能给这些银行造成资产端的系统性风险, 因为这些中小银行的贷款比较集中于特定地区的特定企业。一家大企业破产, 为其提供贷款的中小银行就可能遭遇困境。因此,

在 2017 年后几个季度, 一些地区的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可能爆发重大风险事件, 甚至面临破产清算的威胁。而一旦这样的事件连环发生, 就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较大冲击, 从而再度导致监管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的救助兜底行为。

风险六: PPP 项目蕴涵的潜在风险

2017 年年初,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处于高位。在中央财政没有突破 3% 的赤字率底线、地方财政扩张难以为继的背景下, PPP 成了地方政府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抓手。然而, 由于目前的 PPP 项目大多投资金额大、投资期限长、投资回报率低, 民间投资缺乏参与的热情。因此, 目前 PPP 项目的资金来源还是主要靠银行融资。平安证券宏观策略团队最近的一项针对国内数千个 PPP 项目的调查表明, 在一个典型的 PPP 项目中, 地方政府出资仅为 5% 左右, 10-15% 的资金来自地方产业引导基金(这算 PPP 项目的资本金, 但产业引导基金的优先级主要被银行认购), 其他所有资金均来自商业银行。这就意味着, 地方政府在以高达 15-20 倍的杠杆经营 PPP 项目, 而一旦 PPP 项目出现问题, 银行无疑会受损惨重。近期, 银监会开始调查一些代表性 PPP 项目资本金中的银行出资问题, 说明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其中的风险。而一旦 PPP 项目实施进度低于预期, 那么 2017 年基建投资增速能否持续维持在高位, 将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